

2019年6月

新聞媒體信任度影響因素－以三鶯地區為例

王鏡雯、游宸安、張舫珊、黃極

徐子翔、陳韋仲、余采叡、高嘉呈、李敏柔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電視新聞媒體多元的時代，個人接收的訊息日益增多，同時，媒體對於個人與社會有十足的影響力，但隨之而來也產生一些問題。一如閱聽人對於電視新聞媒體的接觸頻率與相信程度是否會受個人政黨傾向所影響，此外，更進一步地探討，在社會網絡中個人與家人、鄰里間政治傾向異質性的高低，是否同樣也會影響閱聽人對於電視新聞媒體的觀看頻率與相信程度。此次調查之受訪者為三鶯地區居民，據研究結果顯示，個人政黨傾向為泛藍，對其收看泛藍電視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與接觸頻率皆會越高，又將社會網絡分成家人、鄰里兩部分，可以發現個人與家人間的政治異質性越高（個人政黨傾向為泛藍，家人為非），則個人對泛藍電視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與接觸頻率會減少，然在個人與鄰里間則未發現此現象。

◎ 如需引用，格式如下：

王鏡雯、游宸安、張舫珊、黃極、徐子翔、陳韋仲、余采叡、高嘉呈、李敏柔（2019）新聞媒體信任度影響因素－以三鶯地區為例。國立台北大學社會學系《三鶯人文社會資料庫》。

目錄

| | |
|--------------------|----|
| 摘要..... | 1 |
| 壹、 導論..... | 3 |
| 貳、 文獻回顧..... | 4 |
| 一、 媒體可信度..... | 4 |
| 二、 其他影響可信度之因素..... | 7 |
| 三、 媒體可信度的測量..... | 7 |
| 四、 社會網絡的調節作用..... | 8 |
| 參、 研究架構及假設..... | 11 |
| 肆、 研究方法..... | 12 |
| 一、 研究區域..... | 12 |
| 二、 研究對象..... | 12 |
| 三、 抽樣方法..... | 12 |
| 四、 變項處理..... | 12 |
| 伍、 研究結果..... | 16 |
| 一、 敘述統計..... | 16 |
| 二、 線性迴歸分析..... | 19 |
| 陸、 結論..... | 23 |
| 柒、 研究限制..... | 25 |
| 捌、 參考書目..... | 25 |

壹、 導論

近年來，隨著科技的日新月異以及人們生活型態的轉變，社群媒體對社會的影響力與日俱增。而在傳統新聞媒式微、新興社群媒體興起的傳播環境之下，假新聞更是成為重大的社會及政治議題，而閱聽人的媒體識讀能力在這個資訊氾濫的時代，才是真正有效打擊假新聞的最佳利器。

現今電視新聞媒體的頻道不勝枚舉，然而，卻有數個電視台被有政黨傾向的集團壟斷，成為「有政黨色彩的媒體」，舉凡眾所皆知的中天新聞背後代表的是國民黨勢力、三立新聞背後則代表的是民進黨勢力等。因此，當今天各台電視新聞播報著同一事件的即時新聞整理、懶人包時，面對各台電視新聞的不同報導、不同立場，身為閱聽人的我們該相信何者？又該以什麼作為判斷的依據？此時，新聞媒體可能扮演著為人民傳遞訊息的工具，抑或淪為假新聞開始散佈的溫床。

除此之外，一些研究分析表明：電視新聞比報紙更可信（Abel & Wirth, 1977; Carter & Greenberg, 1965; Gaziano & McGrath, 1986; Jacobson, 1969）國外的研究，如 Westley and Severin's (1964) 的研究詳細說明了「比起其他媒體，更多的人相信他們從電視上學到的新聞.....」、Hovland et al. (1953) 發現，信息的影響可能還取決於發送信息的特定出版物或頻道等等；而在台灣，根據學者羅文輝、陳世敏（1993）和羅文輝（2005）之研究，我們相信在台灣現今的大環境之下，政黨認同可能是影響閱聽人對於媒體可信度的重要因素之一。總結來說，我們可以發現可能影響閱聽人對媒體可信度的因素不勝枚舉（Singletary, 1967；Whitehead, 1968；Berlo et.al., 1969-1970；黃錦祥、梁維國，2004；T. Lee, 2005；T. Lee, 2010），其中個人的政黨傾向這個因素，又令我們感到更有興趣。

因此，本研究首先將會探討：個人的政黨傾向是否會影響個人對收看電視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意即：若個人為泛藍政黨，對泛藍電視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會越高；反之亦然。此外，當閱聽人接收到新聞媒體的資訊後，加上個人的思辨能力、對新聞媒體的既定印象，其相信程

度是否會因為在日常生活中，與他們社交圈的親朋好友討論後而有所改變？形成所謂「同溫層」或「鄰里異質性」的現象，意即個人的社群，如：家人、鄰里，是否會影響其對電視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

當閱聽人在接收新聞媒體資訊時，除了受到自身媒體識讀素養以及個人獨立思辨的能力的影響，「社會網絡」也是影響個人想法的重要因素，根據 Festinger（1957）提出的「認知失調」，以及 Burt（1987）、（Masahiro Yamato & Seungahn Nah, 2017）等人提出的「家人、鄰里結構」如何影響個人來看，當人們只願意接收與自己立場相同的資訊，或對與自己不同立場的資訊強烈抗拒時，就會產生「同溫層」的現象，而對政治、新聞等的想法、判斷也進而與其家人、鄰里等社會網絡接觸群體間有密切相關。

綜上所述，我們希望透過這個研究來探討以下：一、個人的政黨傾向是否會影響其對收看電視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二、家人的政黨傾向是否會調節個人政黨傾向對電視新聞媒體相信程度的作用？三、鄰里成員的政治異質性是否會調節個人對電視新聞媒體相信程度的作用？

藉由本研究，期望能重新思考在全球化的時代下，新聞媒體以及閱聽人間的關係。當媒體在時代變遷下已難以單純地作為為人民傳遞訊息的工具，同時受到經濟發展的困境、同業間的競爭、抑或是政府對於媒體管理積極或消極的政策等影響，媒體以及個人該如何因應時代的難題便成為至關重要的課題。

貳、 文獻回顧

一、媒體可信度

（一） 觀眾對媒體的信任

信任一般的意義上，「是一種心理狀態，包括基於對另一個人的意圖或行為的積極期望而接受脆弱性的意圖」（Rousseau, Sitkin, Burt, & Camerer, 1998, p.395）。以信託方式比喻，信任關係在兩方不確定情況下進行互動，委託人無法確知獲利或損失，因此信任也意味著委託人方的不

確定性。觀眾對媒體的信任概念將來自人際互動的信任概念應用於受眾與媒體的互動。根據美國 2006 年調查顯示，民眾幾乎不信任媒體的百分比從 1973 年至 2006 年間提升許多。有些人將觀眾信任度下降的現象歸咎於政客們，因為他們不斷地抨擊媒體（Domke, Watts, Shah, & Fan, 1999）；有些則認為，是媒體報導涵蓋範圍越來越多，導致觀眾對新聞失誤和醜聞的認識提高的結果（Watts, Domke, Shah, & Fan, 1999），或人們對媒體持懷疑態度是因為媒體本身就是憤世嫉俗（Cappella & Jamieson, 1997）。

（二） 媒體的可信度的影響因素

早期對於媒體可信度相關的研究，可信度的概念常以信譽、形象等詞語出現，但最常採用的詞語則為「可信度」（credibility）（Brambeck & Howell, 1976）。

閱聽人對於可信度的評估可分為兩種，一種為來源可信度，一種為內容可信度。來源可信度——訊息來源是否誠實報導（Hovland and Weiss, 1951），訊息來源的媒體其形象會影響閱聽人對訊息的信任程度，凡舉媒體的專業知識、可信賴性、偏激言論都可能對其形象與可信度產生正或負面的影響（Eagly et.al., 1978；Chaiken, 1979；Wathen and Burkell, 2002）。內容可信度——在訊息內容的類型、呈現方式、語氣、描述上皆會影響閱聽人對訊息的信任程度（Aronson, et. al., 1963；Rhine and Severance, 1970）。

研究發現，以媒體端來說，影響媒體可信度之因素有：媒體的新聞專業、新聞責任、新聞能力、活力、客觀性、穩定性、直得信任、網站互動、訊息策略、陳述、呈現方式等因素皆會影響閱聽人對其的信任度（Singletary, 1967；Bowers and Phillips, 1967；Whitehead, 1968；Berlo et.al., 1969-1970；Jacobson, 1969；Gaziano and McGrath, 1986；黃錦祥、梁維國, 2004；Newhagen and Nass, 1989）。

以閱聽者角度來說，其對某一媒體的既有印象、使用頻率、每日閱讀新聞時數皆會對媒體可信度有正面影響，而每日上網時間對於「網路媒體」則有負面影響（黃錦祥、梁維國, 2004），不同於傳統媒體可信度研究之正面影響，此研究指出可能的原因為網路媒體上充斥過多使用者言論與未經證實

散步的消息，使讀者認為白費時間（Bordia and Rownow，1998），或是網路老手對資訊造假事件有感，已失去信心，因此上網時數較多的讀者反而對可信度評價較低（葉恆芬，2000）。然而，在 Rimmer and Weaver（1987）與 Wanta and Hu（1994）以及 Kiouisis（2001）之研究中顯示，媒體的使用頻率與可信度並無強烈關聯，但發現受訪者對於特定媒體的依賴程度會與可信度有關。

（三） 政黨傾向對新聞媒體品牌信任度的影響

過去研究發現，政治傾向，意識形態和政治黨派關係與消費者對新聞媒體的信任有相關（Jones，2004；T. Lee，2005；T. Lee，2010）。Jones（2004）研究指出，政治傾向以及政治參與（Participation & involvement）（Tsfati，2002；Eveland & Shah，2003）會影響觀眾對媒體的信任，保守派更加不信任新聞媒體，自由主義者則更加信任，而那些政治態度極端的人比溫和派更不信任（Gunther，1988），較高的政治參與則會對媒體較不信任。T. Lee（2010）分析民主黨、自由黨對於媒體的信任度皆下降，而共和黨對媒體的信任度上升的原因，可能為拉鍊門事件與柯林頓（民主黨）的彈劾報導有關，暗示政黨傾向著實會影響民眾對媒體的信任度。政黨偏好愈強的選民，愈可能出現選擇性接觸媒體的行為（Jones, Schulz-Hardt, and Frey，2005；Stroud，2007；劉正山，2009）。

過去多篇文獻顯示，政黨傾向也與民眾偏好的媒體有關，無論報紙與電視新聞均有明顯的政治偏差（political bias）（Lo，Neilan，& King，1998；羅文輝、黃蕙蕙，2000），閱聽人選擇的報紙或電視新聞，往往是最符合他們思想、信念與態度的報紙或電視新聞。根據 Kiouisis（2001），閱聽人不會去接收他們認為不可信的新聞，已有政黨傾向之閱聽者對屬於同一傾向之新聞媒體，且會有較高的可信度且即使此新聞媒體報導敵對立場之新聞也不會影響其對同一事件之可信度（彭賢恩、張郁敏，2008）。羅文輝（2004）發現，政黨傾向對新聞媒體的可信度有直接的影響，政黨傾向也會透過新聞媒體的選擇，對該媒體的可信度產生間接與長期的影響（羅文輝，2004；羅文輝，2005）。

二、其他影響可信度之因素

在人口變項上，研究顯示，收入、性別（Carter & Greenberg, 1965; Mulder, 1980; Johnson & Kaye, 1998; 葉恒芬, 2000）、教育程度（羅文輝、陳世敏, 1993）與年齡（Mulder, 1980; Gantz, 1981; 羅文輝、陳世敏, 1993; 葉恒芬, 2000）會顯著影響媒介類型、媒介產品的使用多元化與媒介可信度（引自羅文輝, 2013）。教育程度偏低、年紀較大者，明顯地比教育程度高且年紀較小者更容易選擇使用單一的媒介類型（張郁敏, 2012），且傾向對新聞可信度有較高評價（徐美苓, 2015）。因此，本研究將收入、性別、教育程度以及年齡列入控制變項，希望在控制這些變項的影響後，探討政黨傾向和電視新聞可信度之間的關聯。

三、媒體可信度的測量

以往對於媒體可信度之研究，以「媒介類型」（如報紙、電視）做比較為多，屬於「新聞管道可信度」（e.g., Becker, Whitney & Collins, 1980; Carter & Greenberg, 1965; Gantz, 1981; Lee, 1978; Starck, 1969），而以同一類型的媒體中不同品牌研究其可信度差異之研究較少，且每個受訪者對新聞媒體的「認知參考點（cognitive reference）」也大不相同，在評估某類媒體可信度時，所想像的媒體品牌並不相同（如：聯合報與中國時報），因此對該類媒介可信度的評估有失準確（Greenberg & Roloff, 1974; Abel & Wirth, 1977）。

測量接收訊息者對消息來源的可信度評估，可分為「消息來源可信度」——主要探討傳播者的可信度（個人、團體、組織）；以及媒介可信度。其次，又分為對媒體類型（media types）或媒介產品（media products）的可信度評估。媒體類型如報紙、電視等；媒介產品如報紙中的自由時報、中國時報等。

過去研究顯示，若以媒體類型為測量單位，媒介使用與媒介可信度為正相關但相關程度不高（羅文輝、陳世敏, 1993），且以媒介產品為測量單位可以顯著的預測受訪者最相信的媒介產品（媒介可信度），即傾向認為他們

所選擇使用的媒介產品最為可信；且提出以媒介產品為測量單位預測受訪者最相信的媒介產品，而非以媒體類型為測量單位，可使測量媒介使用的基準與認知參考點相同（羅文輝，2004）。Carter & Greenberg（1965）指出電視新聞被認為比報紙更可信，而 Kioussis（2001）則發現消費者認為報紙比網絡和電視新聞更可信，但因台灣地區，電視新聞多數報導政治新聞，因此，綜合前述，本研究以電視新聞作為依據建立的假說為：

假說：個人政黨傾向與其收看電視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相關。

四、社會網絡的調節作用

（一） 同溫層現象的形成

近來許多文獻討論同溫層效應、以及其對個人態度、信仰、價值觀的影響。心理學家從認知角度來解釋同溫層的意義。透過有關謠言和信仰的實驗，Festinger（1957）提出了” 認知失調” ，指的是當人同一時間存在著兩種互相矛盾或不協調的認知（包括觀念、態度、行為等）時，會產生心理衝突以及緊張感，為了改善緊張而改變自身行為或想法，大腦會選擇性忽略或合理化所接收到的訊息藉以消除衝突，使認知恢復調和一致。當意見不一致的他人或群體吸引力或重要性越大時，個人所產生的認知失調也就越大，因此，人們會透過尋找支持自己或擁有相同認知的人來消除失調。進而產生了” 同溫層現象” ---泛指人們只願意接收與自己立場相同的資訊。對於不同觀點的事物，選擇性地忽略，進而形成一個封閉且穩定的同溫層。但其實這種穩定的現象，是自己將意見相左的看法拒於門外，而製造出的假象（王貞懿，2017；李坤翰，2017）。

後羅文輝（2004）以認知失調理論為基礎，提出「選擇可信度」（selective credibility）的概念，閱聽人會選擇使用和他們思想、信念較相近的媒體（Cotton，1985；Zillmann & Bryant，1985），並且認為這些媒體較為可信，所以媒體的可信度是閱聽人選擇的結果，因此為「選擇可信度」，也

代表選擇性信任。Amiot Catherine (2005) 也證明當個體強烈的認同他們的群體時，會產生內群體偏好和外群體偏見。

綜合以上來看，人們傾向於去接受與原有政治態度相符的訊息，而會排斥與自己相左的意見，民眾對於媒體品牌的可信度，會因認知失調產生的選擇性忽略、接收或合理化所接受的訊息以符合自身主觀的既定想法，個人得以降低因政治討論可能帶來的潛在壓力，進而自我強化原有的政治偏好，並促成同溫層的產生。

(二) 與他人之間的交流與接觸如何影響個人

承接前面同溫層效應的討論，人際網絡是建構同溫層的主要機制。若是人際網絡中，與個人的態度、價值、信仰相近的人越多，同溫層可能更緊密，可能強化個人既有的態度、價值、信仰；相反的，若是人際網絡中與個人的態度、價值、信仰不同的人越多，那麼個人的態度、價值、信仰更可能受到挑戰、進而發生改變。換句話說，個人與其人際網絡間的同質性或異質性程度，可能會調節個人的態度、信仰、價值。連結到媒體可信度議題，人際網絡也可能調節個人對媒體的信任度。

(三) 人際網絡種類：家人、朋友、鄰里

人際網絡也多種類別，如家庭關係、朋友網絡、鄰里互動等。林聰吉 (2007) 引用 Burt (1987) 提出的社會凝聚理論解釋政治討論、社會網路、交叉壓力間三者的互動關係：社會凝聚理論強調情感作用，人們在透過社會網絡進行政治討論時，彼此間的政治影響力建立在親近、尊重、信任與相互關懷等心理因素上，因此，與個人在情感上最親近與信賴的對象，無論是親屬或非親屬，是最有機會透過日常生活中的互動交談來影響個人的政治態度，且其與諮詢政治意見之對象的親疏程度與意見同意度會有高度正相關 (林聰吉, 2007)。Van der Poel (1993) 亦提出情感網絡中，成員保持親密的互動關係，成員的思想感受或行為都會透過互動彼此影響，當人們持續互動累積信任，情感連結逐漸增強彼此甚至會產生合作行為。

就朋友關係而言，過去認為人與人之間的友誼關係，是建立在態度與行為上的類似性（similarities），因為價值與態度上的類似性，讓個人與網絡結構形成了相互依賴的關係，而已成為結構中的朋友關係，反過來也會影響個人的價值與態度。於是人們因為價值的類似性而彼此結合在一起，另一方面，同一團體的成員也會因為群體價值而愈益趨同（翟本瑞，2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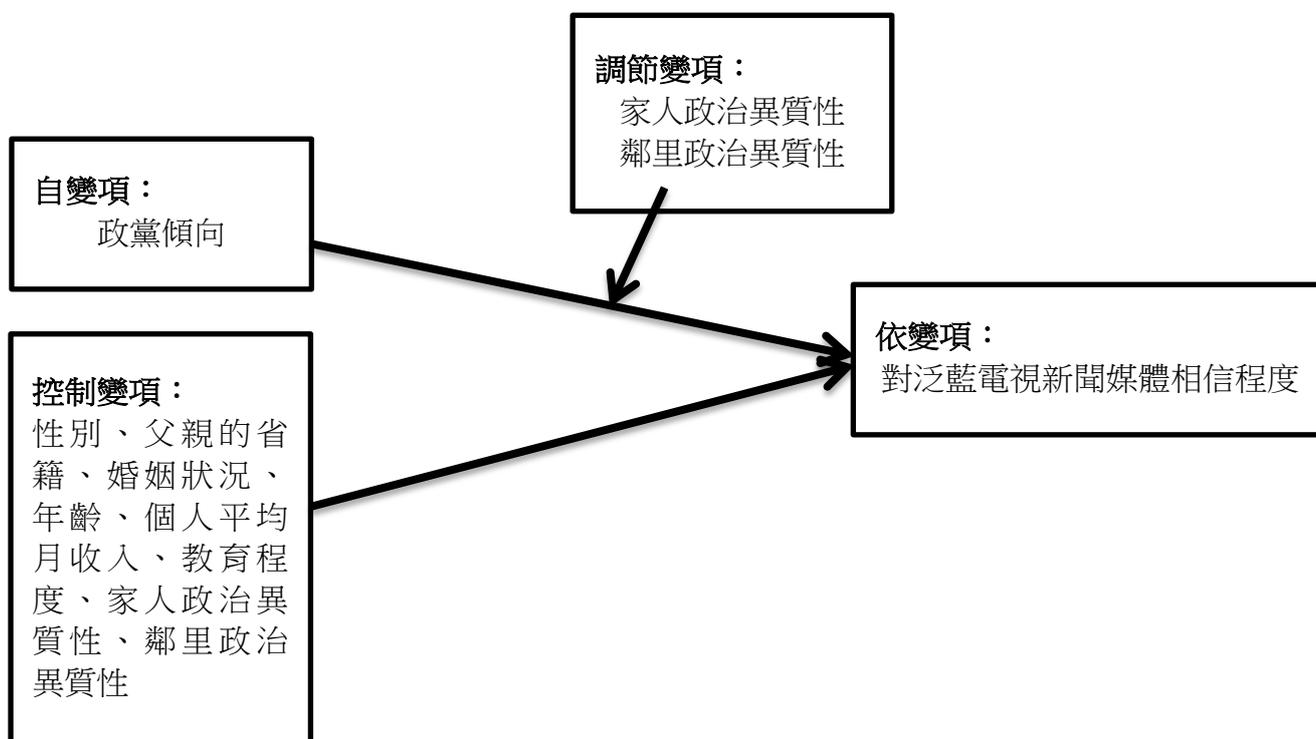
鄰里互動是另一類人際網絡。Burt（1987）提出的結構相等論則偏重社會結構因素，人際間政治影響力的大小決定於個人分享相同社會網絡結構的程度，例如是否居住在相同地區，由於人們習慣在特定的場合與相同的對象接觸，因此政治討論可能以無意識或有意識的型態在處於同一社會場合的人際間進行，故個人的政治態度也就在潛移默化中被他人所影響。

當個人身處在結構更加多元的鄰里時，人們會更容易發現並體驗到不同的社會團體、其文化和生活方式。即便人們通常更願意和觀念相仿的他人互動（McPherson, Smith-Lovin & Cook, 2001），但結構較多元的鄰里至少提供給人們更好的機會去認識，或理解不同的生活模式。社會中，菁英階級所領導的主流媒體在描述多樣化的社會團體時，往往帶有些許偏見或誤解，其報導內容不見得與現狀全然相符。（Donohue, Tichenor, & Olien, 1995; Hallin, 1986; Larson, 2006; D. M. McLeod & Hertog, 1999）因此，身處在結構多元的環境下的人們，可能會察覺到他們認識的社會團體與媒體所描述的有所差異，這個差異便有機會使人們對於媒體的信任程度下降（Masahiro Yamato & Seungahn Nah, 2017）。

過去其他研究亦顯示（Hunt Allcott and Matthew Gentzkow, 2017；Jones, Eva, Stefan Schulz-Hardt, and Dieter Frey. 2005；Stroud, Talia. 2007），在社區層級的面向，政治異質性和信賴度將會是正向關係，意即結構的多元化會影響人們對媒介的信任程度；而政黨傾向的不同也會影響。

參、 研究架構及假設

本研究架構如（圖一）下：



根據文獻回顧，本組研究假設如下：

假設一：個人的政黨傾向會影響個人對電視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具體而言，若個人為泛藍政黨，對泛藍電視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會越高。

假設二：家人的政黨傾向會調節個人對電視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若個人的政黨傾向與家人越不相同，個人對與其相同政黨傾向之電視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會下降。

假設三：鄰里成員的政治異質性會調節個人對電視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若個人為泛藍政黨，而其所在之鄰里政治異質性高，則他會對泛藍電視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降低。

肆、研究方法

一、研究區域

本研究於三峽、鶯歌地區為研究範圍，在三峽（含樹林北大特區南園里）、鶯歌共 49 個里中，依照其距離、各里人口特徵計算各里所需發放問卷數量，進而達到具有代表性的研究結果分析。

二、研究對象

受訪對象為 18 歲以上在地居民，分析單位為個人。採量化研究之操作設計，以問卷調查法蒐集資料。

三、抽樣方法

以隔戶抽樣方式發放問卷。首先，依照三峽、鶯歌地區人口比例決定各地區發放份數，比例約為三峽佔 54%、鶯歌佔 38%、樹林佔 8%，而後按此分配，三峽 539 份、鶯歌 380 份、樹林 82 份，共計 1001 份。其次，問卷發放以里長家為起點進行跳號抽樣，戶數抽樣則以各地區各里的人口數為依據。再者，受訪者的抽樣方法為：當在進入抽樣到的戶之後，先詢問該戶 18 歲以上的人口數，並以該日訪問日期除以之，計算過後之餘數由年輕至年長的順位便為受訪對象，舉例來說，該戶 18 歲以上的人口數為 4 位，訪問日期為 19 日，則 $19/4$ ，餘數為 3，則以家中 成年人中年紀由年輕至年長的第 3 順位為受訪者。

最後，有效問卷的份數為 858，然在 858 人的樣本之中，由於操作化之緣故，本研究將變項中含遺漏值之樣本，以完全排除法排除，即指為使分析之群體一致，刪除本研究所使用變項含遺漏值的樣本，得 666 樣本數，並以之作為我們研究分析之總樣本數。

四、變項處理

本研究依變項為「對泛藍電視新聞媒體相信程度」，自變項為「政黨傾向」，控制變項為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個人平均月收入、婚姻狀況、父親的省籍。以簡單迴歸、多元迴歸等分析方式測量個人對泛藍電視新聞媒體相信程度是否受到政黨傾向、社群層級（家人）、鄰里層級的影響。

(一) 依變項—對泛藍電視新聞媒體相信程度

首先，對各電視新聞的相信程度進行操作化，將選項「完全不相信」、「不相信」、「有點不相信」、「有點相信」、「相信」、「完全相信」六個程度，依序換算成 1 到 6 分，數值越高表示越相信該電視新聞媒體。

接著，對所有電視新聞媒體品牌：公視、中視、台視、民視、華視、三立、中天、年代、TVBS、東森、壹電視進行因素分析，根據因素分析結果發現「中天」、「TVBS」兩個變項屬於同一個因素，另外「三立」、「民視」也屬於同一個因素，又排除了其他電視新聞媒體品牌之後總體的解釋量變高，因此選擇留下「中天」、「TVBS」、「三立」、「民視」四個變項作為依變項的依據。

最後，將中天、TVBS、三立、民視四個電視台重新編碼後合併加總為「對電視新聞媒體相信程度」。其中，為使樣本對電視新聞媒體（媒介產品）相信程度具有統一性，本研究以中天、TVBS 兩個「泛藍」電視新聞媒體品牌之六個相信程度分級為基準，另將三立、民視兩個「泛綠」電視新聞媒體品牌的相信程度做反向編碼，將選項「完全不相信」、「不相信」、「有點不相信」、「有點相信」、「相信」、「完全相信」六個程度，依序換算成 6 到 1 分，再將四個電視新聞媒體品牌之相信程度加總作為依變項「對泛藍電視新聞媒體相信程度」。

(二) 自變項

1. 政黨傾向

於問卷題組中，詢問政黨傾向的題目有：「個人政黨傾向」、「2016 年總統選舉中所投候選人之政黨」與「2016 年立法委員選舉中所投之政黨票」，本研究將選項重新編碼為「泛藍” 1” 泛綠” 2” 都不支持” 3”」。其中，泛藍政黨包含「中國國民黨」、「親民黨」、「無黨團結聯盟」與「民國黨」編為 1，泛綠政黨包含「民主進步黨」、「台灣團結聯盟」、「時代力量」與「綠黨社會民主聯盟」編為 2，將遺漏值跟其他（包含拒答、沒有特定支持政黨）合併為「都不支持」編為 3。

經描述性統計分析後，可以發現在三個題組中「泛綠」百分比依序分別佔 31.3%、37.3%、32.1%，其中因 2016 年總統選舉為蔡英文（民主進步黨）當選，加上於分析中可以發現「2016 年總統選舉中所投候選人之政黨」的比例相較於「個人政黨傾向」與「2016 年立法委員選舉中所投之政黨票」的泛綠政黨比例高約 5%，因而不選擇此題組為自變項。另外，「個人政黨傾向」與「2016 年立法委員選舉中所投之政黨票」兩題組的泛綠政黨比例相近，最後，本研究選擇以「個人政黨傾向」為自變項「政黨傾向」進行後續分析。

（三） 調節變項

1. 家人（社群）政治異質性

將受訪者與其家人所支持之政黨是否相同之選項重新編碼，首先將類別變項轉換成數值，「完全一樣」編為 1，「大部分一樣」編為 2，「大部分不一樣」編為 3，「完全不一樣」編為 4，「都不支持」編為 5，「不知道」編為 6。

接著，本研究把「都不支持」視為與家人政治立場相同併入「完全一樣」計算，「不知道」排除成遺漏值，因此剩下四個家人政治異質性的不同程度，分別為：「完全一樣、都不支持」、「大部分一樣」、「大部分不一樣」、「完全不一樣」，而政治立場越不同，其所代表數字越大，即指 1 分為最低分，代表異質性最低（也就是同質性越高），4 分為最高分，代表異質性最高（也就是同質性越低），以此代表受訪者與其家人之間政治立場異質性高低。

2. 鄰里政治異質性

將受訪者依其所居住之里號區分，共分為 49 個里，將各里切割，分別計算。Blau's (1977) 多樣性指數可用於計算政治異質性，該指數表示為 $(1 - \sum p_i^2)$ ，其中 p 表示類別的比例， i 是不同類別的數量，若得分為 0 表示完美同質性，得分為 1 表示最大異質性，而成員均勻分佈在無窮小的類別中。在本研究中，同樣也以該指數 $(1 - \sum p_i^2)$ 計算鄰里政治異質性，其中 i 表示三個不同政黨傾向， p 表示是各里於泛藍、泛綠、都不支持（拒答/沒有特定支持政黨）之政黨傾向的支持度，後將三種不同政黨傾向的支持度平方再加總，計算出來之後再用 1 去相減，其結果則為「鄰里政治異質性」。

(四) 控制變項

將受訪者之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個人平均月收入、婚姻狀況、父親的省籍設為控制變項。其中：

1. 教育程度

將教育程度重新編碼，換算成教育年數。測量項目與對應年數分別為：「無（不識字）、自修（識字、私塾）編為 3，「小學」編為 6，「國（初）中、初職」編為 9，「高中普通科、高中職業科、高職、士官學校」編為 12，「五專、二專、三專、軍警專修班、軍警專科班、空中行專」編為 14，「空中大學、軍警官學校、技術學院、科大、大學」編為 16，「碩士」編為 18，「博士」編為 22。

2. 個人平均月收入

將個人平均月收入重新編碼為數值，並取其中間值，依序為「無收入」編為「0」，「未滿 1 萬元」編為「0.5」，「1 萬元以上，未滿 2 萬元」編為「1.5」，「2 萬元以上，未滿 3 萬元」編為「2.5」，「3 萬元以上，未滿 4 萬元」編為「3.5」，「4 萬元以上，未滿 5 萬元」編為「4.5」，「5 萬元以上，未滿 6 萬元」編為「5.5」，「6 萬元以上，未滿 7 萬元」編為「6.5」，「7 萬元以上，未滿 8 萬元」編為「7.5」，「8 萬元以上，未滿 9 萬元」編為「8.5」，「9 萬元以上，未滿 10 萬元」編為「9.5」，「10 萬元以上，未滿 11 萬元」編為「10.5」，「11 萬元以上，未滿 12 萬元」編為「11.5」，「12 萬元以上，未滿 13 萬元」編為「12.5」，「13 萬元以上，未滿 14 萬元」編為「13.5」，「14 萬元以上」編為「14.5」。

3. 婚姻狀況

將原有選項「單身且從沒結過婚」重新編碼為「單身且從沒結過婚」，「已婚」、「同居或有伴侶」合併重新編碼為「已婚/同居」，「配偶去世」、「離婚」、「分居」合併重新編碼為「分居/喪偶/離婚」。

4. 父親的省籍

對父親之族群重新編碼，將原有選項「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原住民」、「大陸人」、「其他」六個選項重新編碼為「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及大陸人」；而「原住民」與「其他」二項，因在統計中樣本數量需達 20 以上較具代表性，而其二者數量僅有 16，故將受訪者之父親族群為「原住民」與「其他」之樣本刪除。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文獻我們得知，個人對某電視新聞媒體的接觸頻率會影響相信程度，且在本組初步研究中，我們發現接觸頻率與相信程度間的相關係數高達 0.7，代表兩者間有高度影響力，又當我們同時將接觸頻率與相信程度放入分析模型，兩者間高度相關的關係會強烈影響到其他變項，所以最終我們排除接觸頻率，以個人對電視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作為依變項。

除此之外，文獻也提出朋友網絡對個人態度的影響，由於測量朋友政黨傾向的遺漏值非常多，並且，在初步分析中，當我們排除遺漏值後，分析顯示朋友政黨傾向與個人的異質性對個人新聞媒體信任度沒有顯著調節作用，因此，我們最後將朋友政黨傾向的變項排除。

伍、 研究結果

一、敘述統計

以下為樣本資料之次數分配之描述性統計。本研究分析總樣本數共 666 人，分布情形整理如表一所示。分析結果敘述如表一：

表一：個人、家人、鄰里特質分布

| 變項名稱 | | 最大 值 | 最小值 | 平均數/次 數 | 標準差/百分 比 | 樣本數 |
|---------------|---------------|---------|------|------------|-------------|-----|
| 控制變項 | | | | | | |
| 性別 | 男 | | | 355 | 53.3% | 666 |
| | 女 | | | 311 | 46.7% | |
| 父親的省籍 | 閩南人 | | | 526 | 79.0% | 666 |
| | 客家人 | | | 71 | 10.7% | |
| | 外省人（外省人+大陸人） | | | 69 | 10.4% | |
| 婚姻狀況 | 單身且從未結婚 | | | 141 | 21.2% | 666 |
| | 已婚/同居 | | | 463 | 69.5% | |
| | 分居/喪偶/離婚 | | | 62 | 9.3% | |
| 年齡 | | 18 | 84 | 46.73 | 15.11 | 666 |
| 教育程度（年數） | | 3 | 22 | 12.99 | 3.39 | 666 |
| 個人平均月收入 | | 0 | 14.5 | 3.85 | 3.54 | 666 |
| 自變項 | | | | | | |
| 政黨傾向 | 泛藍 | | | 232 | 34.8% | 666 |
| | 泛綠 | | | 238 | 35.7% | |
| | 都不支持 | | | 196 | 29.4% | |
| | （拒答/沒有特定支持政黨） | | | | | |
| 調節變項 | | | | | | |
| 家人政治異質性 | | 4 | 1 | 2.01 | 0.80 | 666 |
| 鄰里政治異質性 | | 0.67 | 0 | 0.59 | 0.09 | 666 |
| 依變項 | | | | | | |
| 對泛藍電視新聞媒體相信程度 | | 4 | 24 | 13.89 | 2.94 | 666 |

由表一可以發現：

(一) 控制變項：

1. **性別**，女生佔 46.7 %，男生佔 53.3 %，可以發現有效受測樣本之性別男性較女性多。
2. **父親省籍**，閩南人佔 79.0 %，客家人佔 10.7 %，外省人（包括外省人+大陸人）佔 10.4%，可以發現有效受測樣本之父親省籍以閩南人最多，其次為客家人，最後為外省人。
3. **婚姻狀況**，單身且從未結過婚佔 21.2 %，已婚/同居佔 69.5 %，分居/喪偶/離婚佔 9.3%，可知受訪者多為已婚/同居者。
4. **年齡**，平均年齡為 46.73 歲，大約以中年人為受訪主體。
5. **教育年數**，平均數為 12.99，約莫落於高中、職左右。
6. **個人平均月收入（單位：萬元）**，平均數為 3.85 萬元。

(二) 自變項：

1. **政黨傾向**，計泛藍政黨傾向人數為 232 人（佔 34.8%），泛綠政黨傾向人數為 238 人（佔 35.7%），都不支持者（包含少數沒有特定支持政黨、拒答者）人數為 196 人（佔 29.4%）。

(三) 調節變項：

1. **家人政治異質性**，若得分 1 分為最低分，表示異質性最低，也就是同質性越高，4 分為最高分，表示異質性最高，也就是同質性越低。有效受測樣本之家人政治異質性最大值為 4，最小值為 1，其平均數為 2.01（分），表示受訪者的政黨傾向和家人的政黨傾向大致是一致的。

2. 鄰里政治異質性，若得分為 0 表示完美同質性，得分為 1 表示最大異質性（Blau's，1977）。有效受測樣本之鄰里政治異質性最大值為 0.67，最小值為 0，其平均數為 0.59（分）。

(四) 依變項——對泛藍電視新聞媒體相信程度

有效受測樣本最大值為 24，表示完全相信；最小值為 4，表示完全不相信，其平均數為 13.89。

二、線性迴歸分析

影響個人對泛藍電視新聞媒體相信程度之線性迴歸分析

首先，以簡單迴歸模型分析個人政黨傾向是否影響對泛藍電視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分析結果如表二：

表二：影響「對泛藍電視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的個人因素之簡單迴歸

| | B (係數) | SE (標準誤) |
|-------------------|-----------|----------|
| 常數 | 11.353*** | 0.821 |
| 控制變項 (對照組) | | |
| 性別 (女) | | |
| 男 | 0.189 | 0.181 |
| 父親的省籍 (客家人) | | |
| 閩南人 | -0.391 | 0.282 |
| 外省人 (外省人+大陸人) | -0.010 | 0.385 |
| 婚姻狀況 (分居/喪偶/離婚) | | |
| 已婚/同居 | -0.426 | 0.298 |
| 單身且從未結婚 | 0.083 | 0.368 |
| 年齡 | 0.018* | 0.008 |
| 教育程度 (年數) | 0.026 | 0.034 |
| 個人平均月收入 | 0.062* | 0.028 |

表二：影響「對泛藍電視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的個人因素之簡單迴歸（續）

| 自變項 | | |
|-------------------|----------|------------|
| 政黨傾向（泛綠） | | |
| 泛藍 | 3.258*** | 0.220 |
| 都不支持（拒答/沒有特定支持政黨） | 1.640*** | 0.209 |
| R ² | | 0.253*** |
| △R ² | | |
| F | | 110.231*** |

+p<.1, *p<.05, **p<.01, ***p<.001

依變項：對泛藍電視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

於控制變項可以發現，年齡對泛藍電視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有顯著的解釋力，表示每增加一個單位的年齡，對泛藍電視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會增加 0.018 個單位（ $B= 0.018, p= 0.023$ ）。個人平均月收入對泛藍電視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有顯著的解釋力，表示個人收入每增加一萬元，對泛藍電視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會增加 0.062 個單位（ $B= 0.062, p= 0.026$ ）。

此迴歸模型的總解釋力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 $F= 110.231, p<0.001$ ）。其解釋了 25.3% 對泛藍電視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的總變異量（ $R^2=0.253$ ）。從迴歸系數來看，可以發現，政黨傾向泛藍者較泛綠者，對泛藍電視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高 3.258 個單位（ $B= 3.258, p<0.001$ ），意即若個人政黨傾向為泛藍者相較於泛綠者，當其收看泛藍電視新聞媒體時，會更相信泛藍電視新聞媒體播報之內容；而都不支持（拒答/沒有特定支持政黨）較泛綠者，對泛藍電視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高 1.640 個單位（ $B= 1.640, p<0.001$ ），同樣也指當個人政黨傾向都不支持者相較於泛綠者，當其收看泛藍電視新聞媒體時，會較相信泛藍電視新聞媒體播報之內容。

其次，本研究以線性迴歸進行分析，同時建立另一模型，加入個人政黨傾向與家人政治異質性、鄰里政治異質性的互動項，以了解家人政治異質性、鄰里政治異質性對於政黨傾向的調節效果。

以多元迴歸模型分析個人政黨傾向與家人政治異質性、鄰里政治異質性的交互作用是否會調節個人對泛藍電視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分析結果如表三：

表三：影響「對泛藍電視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的交互作用之多元迴歸

| | M1 | | M2 | |
|--------------------|-----------|----------|-----------|----------|
| | B (係數) | SE (標準誤) | B (係數) | SE (標準誤) |
| 常數 | 11.269*** | 1.185 | 10.862*** | 1.460 |
| 控制變項 (對照組) | | | | |
| 性別 (女) | | | | |
| 男 | 0.217 | 0.210 | 0.234 | 0.209 |
| 父親的省籍 (客家人) | | | | |
| 閩南人 | -0.479 | 0.325 | -0.477 | 0.322 |
| 外省人 (外省人+大陸人) | -0.155 | 0.443 | -0.130 | 0.440 |
| 婚姻狀況 (分居/喪偶/離婚) | | | | |
| 已婚/同居 | -0.416 | 0.355 | -0.378 | 0.353 |
| 單身且從未結婚 | 0.189 | 0.440 | 0.155 | 0.438 |
| 年齡 | 0.023* | 0.010 | 0.020* | 0.010 |
| 教育程度 (年數) | 0.033 | 0.040 | 0.026 | 0.040 |
| 個人平均月收入 | 0.066* | 0.031 | 0.065* | 0.031 |
| 自變項 | | | | |
| 政黨傾向 (泛綠) | | | | |
| 泛藍 | 3.336*** | 0.244 | 5.789*** | 1.750 |
| 都不支持 (拒答/沒有特定支持政黨) | 1.647*** | 0.248 | 0.972 | 1.572 |
| 家人政治異質性 | | | | |
| 家人政治異質性 | -0.003 | 0.124 | 0.470* | 0.210 |
| 鄰里政治異質性 | | | | |
| 鄰里政治異質性 | -0.447 | 1.055 | -1.087 | 1.695 |

表三：影響「對泛藍電視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的交互作用之多元迴歸（續）

| | | |
|---------------------------|-----------|----------|
| 政黨傾向（泛綠）×家人政治異質性 | | |
| 異質性 | | |
| 泛藍×家人政治異質性 | -1.080*** | 0.302 |
| 都不支持（拒答/沒有特定支持政黨）×家人政治異質性 | -0.400 | 0.300 |
| 泛藍×鄰里政治異質性 | | |
| 泛藍×鄰里政治異質性 | -0.510 | 2.711 |
| 都不支持（拒答/沒有特定支持政黨）×鄰里政治異質性 | 2.557 | 2.398 |
| R ² | 0.259*** | 0.276** |
| △R ² | | 0.017 |
| F | 19.067*** | 3.743*** |

+p<.1, *p<.05, **p<.01, ***p<.001

依變項：對泛藍電視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

分析結果顯示，影響對泛藍電視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的主要效果能解釋約變異量的 25.9 %（ $R^2=0.259$, $F= 19.067$, $p<0.001$ ）。而在控制了主要效果後，政黨傾向與家人政治異質性的交互作用、政黨傾向與鄰里政治異質性的交互作用可以增加 1.7 % 的對泛藍電視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變異量（ $\Delta R^2 =0.017$, $F= 3.743$, $p=0.005$ ）。

首先，就主要效果而言，於控制變項部分，年齡對泛藍電視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有顯著影響，每增加一個單位的年齡，對泛藍電視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會增加 0.023 個單位（ $B= 0.023$, $p=0.014$ ），意即年齡越高對泛藍電視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越高；在個人月平均收入對泛藍電視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同樣也具有顯著影響，每增加一萬元，對泛藍電視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會增加 0.066 個單位（ $B= 0.066$, $p=0.035$ ），意即收入越高對泛藍電視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也會越高。接著，於自變項部分，政黨傾向對泛藍電視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有顯著影響，政黨傾向泛藍者較泛綠者更傾向相信泛藍電視新聞媒

體的播報內容 ($B= 3.336, p<0.001$)，又政黨傾向都不支持（拒答/沒有特定支持政黨）較泛綠者更傾向相信泛藍電視新聞媒體的播報內容 ($B= 1.647, p<0.001$)；然而在家人政治異質性與鄰里政治異質性部分並未能顯著解釋對泛藍電視新聞媒體相信程度。

其次，個人政黨傾向與家人政治異質性的交互作用同樣具有顯著的解釋力，也就是說，若個人的政黨傾向與家人越不相同，個人對與其相同政黨傾向之電視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會下降，更具體來說，泛藍者受家人政治異質性所影響對泛藍電視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相較於泛綠者有顯著差異，其指當家人政治異質性越高，個人對泛藍電視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會下降 ($B= -1.080, p<0.001$)，然此在都不支持（拒答/沒有特定支持政黨）者與泛綠者間則無差異 ($B= -0.400, p=0.182$)。

再者，個人政黨傾向與鄰里政治異質性的交互作用並未具有顯著的解釋力，也就是說，鄰里成員的政治異質性並不會調節個人對與其相同政黨傾向之電視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因此，若個人為泛藍政黨，而其所在之鄰里政治異質性高，並不會影響個人對泛藍電視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的高低。

陸、 結論

經資料分析之後，本研究發現（1）個人的政黨傾向確實會影響個人對電視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加入調節變項之後發現（2）家人的政黨傾向會調節個人對電視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但（3）鄰里成員的政治異質性並不會調節個人對電視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在此研究中，控制了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個人平均月收入、婚姻狀況、父親的省籍 六個變項。於統計資料中可以看到，只有年齡與個人平均月收入兩變項的影響力呈現顯著，由此可知，當年齡越大，對電視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會越高；當個人平均月收入越多，對電視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也會越高，然在其他變項則未顯著。

於研究假設中，我們認為個人的政黨傾向會影響個人對電視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分析結果顯示，當個人政黨傾向為泛藍者相較於泛綠者，在收看泛藍電視新聞媒體時，會更相信泛藍電視新聞媒體播報之內容；而當個人政黨傾向都不支持者相較於泛綠者，當其收看泛藍電視新聞媒體時，也會較相信泛藍電視新聞媒體播報之內容，但其相信程度會較泛藍者低。從而可以知道，當閱聽人欲選擇觀看之電視新聞媒體時，往往會傾向最符合他們思想、信念與態度，且當個人有明確政黨傾向時，於接觸和他有相同政黨傾向的媒體時，會對其播報內容更加相信；其次，我們認為家人的政黨傾向會影響個人對電視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分析結果顯示，雖整體來說，在加入家人政治異質性變項後解釋力呈現顯著，但只有泛藍者在家人政治異質性越高時，其對泛藍電視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會下降，然此現象在都不支持（拒答/沒有特定支持政黨）者與泛綠者間則無差異；最後，我們認為鄰里成員的政治異質性會影響個人對電視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但分析結果顯示，個人所在之鄰里政治異質性的高低，並未顯著影響個人對泛藍電視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高低。從家人與鄰里政治異質性可以發現，當成員越保持親密的互動關係，也就是說，閱聽人「與家人之間的互動」親密程度大於「與鄰里成員之間的互動」，成員間的思想感受或行為都會透過互動而彼此影響，因此，我們相信：當個人身處於政黨傾向較為多元的環境時，會因為成員間的互動而影響他們原先對電視新聞媒體的印象，進而有機會使個人對其原先所較為信任之與個人自身為相同政黨傾向之媒體的信任程度下降。

總括來說，此次研究結果發現，個人會受到其政黨傾向而對於電視新聞媒體有所偏好，進一步對於媒體播報之內容的信任程度也是較高的。然而除了個人政黨傾向因素之外，同時也發現，當與互動關係中親密程度較高的人相處時，舉例來說，像是家人，可能會因為日常上互動頻繁，在意見交流與溝通相對機會也較多，致使影響個人在選擇相信各個政黨立場的電視新聞媒體時，不會單以個人政黨立場思考，其原先的想法或印象可能會因與家人、鄰里的交流互動而改變。

柒、 研究限制

一、受訪者表態意願

在訪問受訪者政黨傾向時，受訪者回答其政黨傾向為「都不支持」或「拒答」者，可能情況有二，其一為真的都不支持，其二為受訪者選擇隱藏自己的政治傾向不願表態，而後者我們無法探求其內心真意，故成為我們研究中自變項的研究限制。

二、接觸媒體媒介限制

在我們研究中的依變項——新聞媒體的接觸媒介中，只採用「電視」媒介，而排除了從其他管道，如網路、報紙、廣播中獲得新聞的受訪者，故從其他管道接收新聞的受訪者成為我們研究中依變項的研究限制。

三、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

受訪者在回答對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時，可能不僅僅受到政治新聞的影響，如社會、財經、氣象等新聞，確實影響到該受訪者判斷其對新聞媒體的相信程度，我們亦無從得知，故成為我們研究中依變項的研究限制。

捌、 參考書目

王貞懿（2017）。隱形的牢籠 同溫層現象。網址：

<https://castnet.nctu.edu.tw/castnet/article/11065?issueID=662>。上網日期：2019/6/13。

李坤翰（2017）。同溫層裡又暖又舒服，為什麼要刻意讓自己「認知失調」？

網址：<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77420>。上網日期：2019/6/13。

林聰吉，2007，〈社會網絡、政治討論與投票參與〉，《選舉研究》，14(2): 1-25。

- 徐美苓（2015），《影響新聞可信度與新聞素養效能因素之探討》。〈中華傳播學刊〉，27: 99-136。
- 張郁敏（2012）。〈因人而異的新聞消費行為:整合新聞媒介與新聞品牌的新思維〉。《中華傳播學刊》，21: 81-177。
- 彭賢恩、張郁敏（2008）。《政治置入性新聞對新聞可信度之影響》，〈新聞學研究〉，95：55-110。
- 黃錦祥，梁維國（2004）。〈網路新聞媒體可信度:構面、評價及影響因素之探討〉。《資訊管理學報》，11（2），85-108。
- 葉恆芬（2000）。《網路媒體可信度及其影響因素初探研究—以台灣地區網路使用者為例》。國立中正大學電訊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 劉正山（2009）。《2008年總統大選競選期間政黨支持者選擇性接觸媒體傾向的分析》。〈選舉研究〉，16（2）：51-70。
- 瞿本瑞（2001）。從社區、虛擬社區到社會網絡網站:社會理論的變遷。資訊社會研究，21: 1-31。
- 羅文輝（2004）。《選擇可信度 1992 及 2002 年報紙與電視新聞可信度比較研究》。〈新聞學研究〉，80：1-50。
- 羅文輝（2013）。〈報紙與電視可信度：1993、1998 和 2003 年的比較研究〉，
《台灣的社會變遷 1985-2005：傳播與政治行為》，頁 65-91。
- 羅文輝、陳世敏（1993）。〈新聞媒介可信度之研究〉。國科會專題研究報告。
- 羅文輝、黃葳威（2000a）。〈報紙與電視總統選舉新聞的比較研究〉。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專題研究報告。
- 羅文輝、黃葳威（2000b）。2000年總統選舉公民營報紙新聞之比較研究），
〈選舉研究〉7（1）：1-20。
- A. Donohue, Phillip J. Tichenor, Clarice N. Olien (1995). A Guard Dog Perspective on the Role of Media. *George*.
- Abel, J. D., & Wirth, M. O. (1977). Newspaper vs. TV credibility for local news. *Journalism Quarterly*, 54, 371-375.
- Aronson, E., Turner, J. A., and Carlsmith, J. M. "Communicator Credibility and Communication Discrepancy as Determinants of Opinion Change,"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67: 31-36.

- Amiot Catherine E, Bourhis, Richard Y(2005). Reconceptualizing Team Identification: New Dimension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to Intergroup Bias. *Group Dynamics: Theory, Research, & Practice, 9(2): 75~86.*
- Becker, L., Whitney, C., & Collins, E. (1980).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How the News Media Operate. *Journalism Quarterly. 57, 571-578, 605.*
- Berlo, D. K., Lemert, J. B., & Mertz, R. J. (1970). Dimensions for evaluating the acceptability of message source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33, 563 – 576.*
- Bordia, P, and Rownow, R. L., “Rumor Rest Stops on the Information Highway: Transmission Patterns in a Computer-Mediated Rumor Chain,”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5:163-179.*
- Bowers, J. W., and Phillips, W. A. "A Note on the Generality of Source Credibility Scales," *Speech Monographs, 34: 185-186.*
- Burt, R. (1987). Social Contagion and Innovation, Cohesion versus Structural Equivalenc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2, 1287-1335.*
- Cappella, J. N., & Jamieson, K. H. (1997). Spiral of cynicism: The press and the public good.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arter, R., & Greenberg, B. (1965). Newspapers or television: Which do you believe? *Journalism Quarterly, 42, 29 – 34.*
- Cotton, J. L. (1985). Cognitive dissonance in selective exposure. In D. Zillmann & J. Bryant (Eds.), *Selective exposure to communication, 11-33.*
- Eagly, A. H., Wood, W. & Chaiken, S. (1978). Causal inferences about communicators and their effects on opinion change. *Journal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6, 424-435.*
- Festinger, L. (1957). A 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Gaziano, C., & McGrath, K. (1986). Measuring the concept of credibility. *Journalism Quarterly, 63: 451 – 462.*
- Gantz, W. (1981). The influence of researcher methods on television and newspaper news credibility evaluations.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25, 155 – 169.*
- Giner-Sorolla, R., & Chaiken, S. (1994). The causes of hostile media judgment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30: 165 – 180.

- Greenberg, B. S., & Roloff, M. E. (1974). Mass Media Credibility: Research Results and Critical Issues. *News Research Bulletin, No. 6.*
- Gunther (1988), Albert, Attitude Extremity and Trust in Media. *Journalism Quarterly, 65: 279-87.*
- Hallin, D. C. (1986).The “uncensored war” : The media and Vietna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ovland, C. I., & Weiss, W. (1951). The influence of source credibility on communication effectivenes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5, 633 – 650.*
- Hunt Allcott and Matthew Gentzkow(2017).Social Media and Fake News in the 2016 Electio.,*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 31: 211-239.*
- Jacobson, H. K. (1969). Mass media believability: A study of receiver judgments. *Journalism Quarterly, 46, 20 – 28.*
- Johnson, T. J. & Kaye, B. K. (1998). Cruising is believing? Comparing Internet and traditional sources on media credibility measures.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75(2), 325-340.*
- Jones, Eva, Stefan Schulz-Hardt, and Dieter Frey. 2005. “Giving Advice or Making Decisions in Someone Else’ s Place: The Influence of Impression, Defense, and Accuracy Motivation on the Search for New Informat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1(7): 977-990.*
- Kiousis, S. (2001). Public trust or mistrust? Perceptions of media credibility in the information age. *Mass Communication & Society, 4(4), 381-403.*
- Larson, S. G. (2006). Media and minorities: The politics of race in news and entertainment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 Lo, V. H., Neilan, E., & King, P. T. (1998). Television coverage of the 1995 legislative election in Taiwan.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and Electronic Media,42(3): 340- 355.*
- Masahiro Yamamoto & Seungahn Nah (2017) A multilevel examination of local newspaper credibility.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terly. (P.1-20).*
- McLeod, D. M., & Hertog, J. K. (1999). Social control, social change and the mass media’ s role in the regulation of protest groups. In D. Demers & K. Viswanath

(Eds.), *Mass media, social control, and social change: A macrosocial perspective*, 305-330

- McPherson, M., Smith-Lovin, L. and Cook, J.M. (2001) Birds of a feather: Homophily in social network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7, 415-444.
- Mulder, R. (1980). Media credibility: a use-gratification approach. *Journalism Quarterly*, 57(3), 474-477.
- Newhagen, J., & Nass, C. (1989). Differential criteria for evaluating credibility of newspapers and TV news. *Journalism Quarterly*, 65, 567 – 574, 588.
- Raymond S. H. Lee (1978). Credibility of Newspaper and Television News, *Journalism Quarterly*, 55, 282-287.
- Rhine, R. J., and Severance L. J. “Ego-involvement, Discrepancy, Source Credibility, and Attitude Chang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6: 175-190.
- Rimmer, T., & Weaver, D. (1987). Different questions, different answers? Media use and media credibility. *Journalism Quarterly*, 64(1), 28-36.
- Rousseau, D., Sitkin, S. B., Burt, R. S., & Camerer, C. (1998). Not so different after all: A cross-discipline view of trust.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3(3), 394 – 404.
- Singletary, M. W. (1976). Components of credibility of a favorable news source. *Journalism Quarterly*, 53, 316 – 319.
- Starck, K. (1969). Media Credibility in Finland: A cross-national approach. *Journalism Quarterly*, 46(4), 790-5.
- Stroud, Talia.(2007). “Polarizing Effects of Partisan Selective Exposure.” Presented at the *2007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San Francisco.
- Tsfati, Yariv(2002), The consequences of mistrust in the news media: Media skepticism as a moderator in media effects and as a factor influencing news media exposure.
- Wanta, W., & Hu, Y. W. (1994). The effects of credibility, reliance, and exposure on media agenda-setting: A path analysis model. *Journalism Quarterly*. 71, 90-98.
- Wathen, C. N., and Burkell, J., “Believe It or Not: Factors Influencing Credibility on the Web,”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53(2):134-144.

- Watts, M. D., Domke, D., Shah, D. V., & Fan, D. (1999). Elite cues and media bias in presidential campaign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6*(2), 144 – 175.
- Whitehead, J. L. (1968). Factors of source credibility.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54*, 59 – 63.
- William P. Eveland Jr., & Dhavan V. Shah(2003). The Impact of Individual and Interpersonal Factors on Perceived News Media Bias. *Political Psychology, 24*(1): 101-117.
- Winston L. Brembeck & William Smiley Howell (1976). Persuasion, a means of social influence. *Englewood Cliffs*.